

## 【论 文】

# 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途径、观念与叙事<sup>1</sup>

范 可<sup>2</sup>

**摘要：**民族和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擅长研究小社区的人类学而言，民族主义作为课题是个挑战。为此，人类学家通常关注诸如地方文化如何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影响，以及传统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何为民族主义所利用之类问题。从理念上而言，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着亲和性，甚至互联性，并通过一系列的叙事建构来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恒久性与辉煌或者苦难的经历。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叙事；历史

## 引言

大约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股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此之前，由于海外殖民地贸易兴起刺激了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开始在西欧一些社会中启动，社会上也出现相应的要求。这些要求导致了原先农业国家状态下的异质性社会向同质性社会的过渡。国家内部权力日益集中，出现了对社会的掌控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社会同质化必然导致在国家社会中浮现出那种原先不见于农业社会的大体一致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心态——教育日益普及和传媒业或传媒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人们共享许多信息，这也会导致人们对一些事件的发生有大体相近的反应。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nation）也就渐渐地步入历史舞台。<sup>3</sup> 所以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才说，现有国家后有民族。事实上，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运动也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也并非所有的民族都产生在国家之后，问题在于，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资格及其正当性，并非由民族成员自身说了算（尽管必须自我界定<sup>[2]</sup>）而是取决于业已存在的其他民族国家是否认可。

民族主义长期以来都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地方上的群体，无论这样的群体如何改头换面——种族、部落或者族群以及那些相对于现代社会显得更为保守，或者更似“村落”的社会。近几十年来，引起人类学者关注民族主义大概至少有以下 5 个因素。其一，人类学家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separationist movement）；其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国家解体后所出现的局面。东欧国家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往往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原来的意识形态，抬出历史上英雄人物和民族主义人物叙事来重建民族认同；<sup>4</sup> 其三，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以族群和民族为边界的战争。这是一场

<sup>1</sup>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 年第 6 期，第 37-49 页。

<sup>2</sup>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全球化。

<sup>3</sup> 在此的民族（nation）与我国“56 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不同，港台经常用的是“国族”。“民族”乃约定俗成且沿用已久。

<sup>4</sup> Katherine Verdery,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Reburials: Reburial and Socialist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范可“遗体政治学”见范可《漂泊者的返乡之旅》，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令世人警醒的族群和民族之间的惨烈杀戮。与此同时，有些正在一些亚非拉国家里从事族群性问题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也因此关注民族主义和民族建构问题；其四，20世纪80年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在其他领域里取得突破性进展，刺激并吸引了人类学家投身这一课题。<sup>1</sup>典型的例子便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en）和盖尔纳（Ernst Gellner）在1983年分别出版的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与分析，激发了许多人类学家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趣。这两部充满洞见之作一改原先由政治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承包”的领域所欠缺的灵动，在很大程度上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民族主义崛起和得以持续存在的社会文化时空条件和政治经济学背景，令人耳目一新；其五，全球化。在20世纪80尤其是90年代之后，人口跨国流动，信息四通八达，影响了一些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再度活跃，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distance）——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可以在境外指挥和影响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以下，本文谨就理解民族的几种路径、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叙事与认同作讨论，以求就正于方家。

## 一、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几种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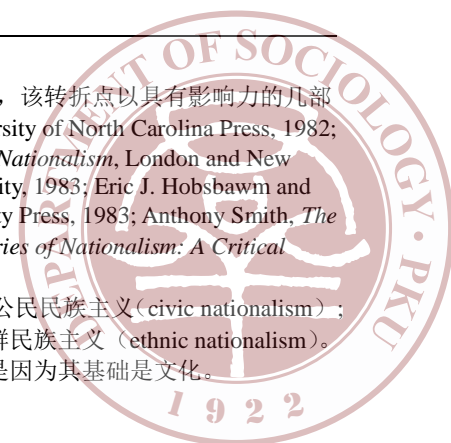
人类学向来以研究小型社会和边远社区著称，地方群体历来是经验研究的焦点所在。如果研究必须考虑到国家，多半也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国家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如何影响地方的条件、地方历史构成以及如何影响地方精英和一般人的观念等等。至少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对人类学来说，民族主义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其规模之宏大必然对人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挑战，人类学者很难将这样的大型社会政治现象置于一个小型的社区来考察，因而人类学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自然就有了其他途径。民众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建构运动中迟早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正是许多人类学家等兴趣所在。所以人类学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会关注官方的民族叙事如何影响地方传统社会文化；或因研究族群性的需要，关注了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互动和竞争。而国家社会在民族建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文化产品如何影响和渗入传统的社区生活，以及民众又是如何将这些产品与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仪式性成份结合起来。有些人类学家则研究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书写，论证了民族主义者如何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历史。

人类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与文化边界重叠这样一种原则之上的情感态度和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态度（sentiment）表现为对违背这一原则的愤怒，或者为执行和满足这一原则感到欣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就是使这种情感态度成为现实<sup>[1]</sup>。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因其特点分为西方民族主义（the Western nationalism）和东方民族主义（the Eastern nationalism）两类。这是德国学者汉斯·科恩（Hans Kohn）所作的区分。<sup>2</sup>前者较为温和，后者往往走向凶狠和排外<sup>[3]</sup>。西方民族主义其实并不仅发生在西方工业

2017年版，第230页-239页。

<sup>1</sup> 土耳其学者 Umut Ozkirimli 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研究民族主义的转折点，该转折点以具有影响力的几部著作作为标志，如：John Armstrong,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Benedict Anderson, *Imag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参见：Umut Oz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2）。

<sup>2</sup> 汉斯·科恩又称西方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ist nationalism）或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东方民族主义指的是西欧东边的德国和一些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又称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强调民族之所以为民族是因为其基础是文化。



国家，也发生在美洲殖民地；东方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内陆出现。两种民族主义都主张主流社会的文化与语言应该在国家版图之内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nation）呢？学术界公认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概念。<sup>1</sup>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民族的理解经常是民族主义研究中提及的。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还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形成的<sup>[4]</sup>。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并未涉及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很容易让人觉得民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马克思·韦伯从主观情感的一面来的理解民族，但也觉得辨明何为民族并非易事。

“民族”这个概念毫无疑问首先意味着，在面对其他群体时，一个人可以从某些人群中获取一种团结一致的特殊情感。所以，这个概念属于价值观念的范畴。然而，对于如何界定这个群体或者这种团结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行动，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sup>[5]<sup>112</sup></sup>

安德森<sup>[6]<sup>3</sup></sup>和盖尔纳<sup>[1]<sup>11</sup></sup>也都承认民族难以定义。人类学者尽管可以指出部落的“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性质。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不属于某个民族，那将寸步难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强调自己尊奉的原则是上天所赋予的。然而，民族与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偶发的存在。民族和国家的偶发性也有不同。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和民族缺一不可，而且命定如此，但国家的出现却可以没有民族的存在。如果国家与民族缺一不可的说法可以成立，那就得有一个前提，即二者同时存在，但条件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民族的浮现不仅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反而被压制，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希望分裂，都不希望分离成为事实。还有一些群体宣称“民族”，那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这部分群体的人士当然意识到，作为民族更有尊严。这可能是来自两方面的影响所致。其一，国家民族叙述中的社会达尔文思想；其二，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诉求经常将“民享”作为号召，如果无视境内其他族群的存在，或对他们的话语权不尊重，迟早会激起境内其他族群关心自身基本权利的认同政治运动<sup>[7]<sup>99</sup></sup>。

盖尔纳深受韦伯对理性化和现代性诠释的启发指出，工业化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工业地区在大工业生产中谋取生计。但大工业劳力的准入标准完全与农业不同，那就是需要有起码的识文断字的能力。为此，学校教育开始普及，文凭和证书成为各行各业的准入条件。这么一来就使原来异质性的农业社会渐渐转变为同质性的工业社会，由此而引起的文化整合，为民族主义崛起和民族（nation）形成奠定了基础<sup>[7]</sup>。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带动了教育的日益普及，而社会的同质化则与由主流群体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而取代原先形形色色方言相得益彰。来自不同地的民众聚集在工业化的城市区域生活，也要求了解各种信息，传媒业必然随之产生。报纸是现代传媒的最早的形式。报纸的优势在于，它的文字语言都是社会上最多人使用的——原先作为某种方言存在的——语言。当原先可能属于某一地方的方言被社会广为接受，特别是统治者所认可时，这种方言就成为了官方语言。

一旦一个社会有了通用的语言，那就为民族形成打下了基础。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将之想象为与生俱来和至上的权力（sovereign）。他强调了语言在型塑民族认同上的重要作用。“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发明共同体”，而是意味着人们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绝大部份成员都不认识也没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而是仅仅在脑海之中的共同体的一分子<sup>[6]<sup>6</sup></sup>。安德森的关注点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方面，而是在于理解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力量与坚持从何而来。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为民族国家而死，说明了这种力量不同寻常。

西方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发源地。盖尔纳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在什么地方首先出现，在

<sup>1</sup> 关于民族（nation）作为一个术语的由来，可参考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简要稽考。参见：（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3页。

<sup>2</sup> 转引自（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他讨论中，鲜少提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安德森不一样。他认为首先出现民族主义的区域是美洲大陆。盖尔纳的民族发生学理论建立在逻辑推导和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既然工业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产生，那么西欧是民族主义的诞生地是不言自明的。盖尔纳的研究大笔如椽却失之于线条过粗，遭致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中，最为常见的是指责他未能揭示出现民族意识的情感层面<sup>[8]</sup>。佩里·安德森（Parry Anderson）就批评盖尔纳的理论无法解释民族主义激情从何而来<sup>[9]</sup>。盖尔纳还被批评误读工业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一，众多的例子证明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在一些还没有工业化的社会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信条来自德语，但在这一信条出现的18和19世纪之交，日耳曼社会还没开始工业化；其二，工业化未必需要民族主义。英国和美国是最早工业化和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开始和进入工业化后的很长时间内，民族主义一无所知<sup>[10]</sup>。总之，不少学者认为，工业化不是民族主义的必备条件。

盖尔纳后来对他的理论作了重新思考，阐述他有关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工业化社会转型，将民族主义的出现到高涨作了5个阶段划分，提供了从非民族主义秩序过渡到民族主义秩序的合理文本。但批评者认为，其适用性有限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盖尔纳考虑到了欧洲历史和文化条件上的多样性，将从西到东做了4个时区（time zone）的划分，但东端甚至未及俄罗斯而是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交互影响、争夺的区域。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欧洲作为思考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4个时区的划分则力图将各种条件下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考虑在内。<sup>1</sup>

安德森主张18和19世纪之交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最早掀起民族主义浪潮。他以一种将心比心的方式体会人在旅行穿梭中与他者相遇时产生的“边界”之感，这种感受成为他考虑民族意识产生的出发点。民族得以产生和存在也需要他者。安德森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有关“旅行”（journey）使人感受到在时间之间、地方之间、身份之间产生不同意义的经验时指出，欧裔定居者即克里奥尔人（Creoles）因出生于殖民地，<sup>2</sup>他们的社会政治流动受到限制。凡不是在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身份低于西班牙本土出生者。这种歧视在克里奥尔人回到祖国之后有深切的体会。而这样的歧视与殖民地出生身份重叠，使克里奥尔人产生一种“束缚的朝圣”（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这就使这些被宗主国统治阶层歧视的旅伴们最终将自己出生的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祖国，同时也会将被殖民者视为同一民族<sup>[6]53-65</sup>。安德森告诉我们，为什么民族主义首先在美洲出现，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又如何从殖民地的上层精英开始。但是，民族意识广为扩散则是在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崛起之后。

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对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是很重要的。这也不难理解，当人们互相能读懂彼此所读之物，会有一种感觉——“嘿，我们是一伙的”。共同体（community）这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应该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首创的。我们可以将之简要理解，所谓共同体就是“熟人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有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能来自血缘、地缘、宗教，或者兼而有之。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情感纽带则把不认识、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但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维系在一起。试想，当一个人离乡在外，终日因人生地不熟而沉溺于怀乡的离愁别绪当中，有一天突然感觉周围的人都因为了解同一件并非发生在身边的事所激动、震撼时，进而发现发生异乡之事被如此之多的人所知道，竟是因为读懂同一份报纸！这时产生一种亲近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突然遇到家乡的熟人的那种感觉。

安德森非常细腻地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民族意识的情感基础。以上提及他对克里奥

<sup>1</sup> Ernest Gallner, *Nation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7.

<sup>2</sup> 克里奥尔人在16~18世纪时本来是指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这个名称后来有了各种意义，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甚或矛盾。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克里奥尔人一般被排斥于教会和国家的高级机构之外，虽然法律上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是平等的。

尔人的“束缚的朝圣”的解读，也是从情感上分析了克里奥尔人如何因为感受到出生地不同所导致的在身份和社会流动上所受的制约，而在情感上日益疏离他们原先认定的“祖国”，转而将殖民地当作自己父母之邦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安德森所论及的是殖民地上层精英滋生民族意识的心理过程，那么，盖尔纳（尽管他的理论在细节上经常不可推敲）则从整个社会结构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变，支持了安德森印刷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工业化带来的识字率的提高成为现实，读报的人多了起来，信息也就不再限制在狭小的地方或者区域空间里，而是极大地拓展，这就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盖尔纳和安德森的理论虽有所区别但在许多地方是兼容的。他们都认为民族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延续——因为地球上的民族仅仅占有潜力成为民族的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主张民族是建构的，是寻求在文化群体与国家之间锻造炼接的结果。盖尔纳和安德森两人都设想抽象的、建立在不同秩序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地缘与血缘——也就是建立在差序格局基础上的共同体。安德森想要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是“异常的事物”（anomaly）。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民族主义不应该在个体主义的后启蒙世界存活。民族主义的“原生忠诚”（primordial loyalties）和基于共同起源和文化之上的团结根本与后启蒙时代的精神不符。他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乃在于，“民族性”（nation-ness）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生活里最主要的合法价值<sup>[6]3</sup>。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只有民族才拥有话语权。

盖尔纳的学生，以研究民族主义闻名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是一位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民族主义的高潮中作出贡献的优秀学者。他的重要著作《民族及其族源》强调民族建构的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族群一定会成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的产生有特定的条件，但是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往往会发掘历史资源来为建构中的民族的合法性提供支持。<sup>1</sup>史密斯提出自己的核心概念——ethnic，我们姑且将之翻译为“古代民族”。这个概念不同于族群。人类学谈论的族群，其形成与存在可以是国家“不在场”的。在这个意义上，族群性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在国家的语境里，促成族群意识的浮现可能还会有来自其他的主体的影响<sup>2</sup>史密斯的“古代民族”所指的“不仅是有着共同称谓、血统神话、历史、文化和地域的组织的人口范畴，而且还是明确的认同感和团结感的共同体。这种认同感和团结感经常见之于制度性的慈善表达（institutional philanthropic expression）”（笔者译）。<sup>3</sup>

在史密斯看来，能够被认为是“古代民族”或者“族群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的群体，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必须有强烈的从属感和活跃的团结感，当处于紧张和危险状态时，能超越共同体内部存在的阶级、虚拟或地方的区隔。在实践中，活跃的团结感和各种形式的合作有如晚近完全成熟的被认可的民族。史密斯论及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民族时指出，其存在还有赖于群体内受过教育的阶层。只有他们才能使团结感和共同体有生命力，因为他们才能使这类感觉传导给共同体之内的其他阶层和其他地区。而且，只要存在着对这种族群共同体的感觉，周期性再现的族群团结和制度性的合作有足够的力量与深度来化解其他种类的忠诚——尤其在面临来自敌人威胁和其他危险的时候。<sup>4</sup>

与盖尔纳和安德森不同，史密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但这不是历史必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上的族群共同体都能步入世界的民族之林。盖尔纳和安德森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但强调了一定的条件下会促成民族主义的兴起，所以他们主

<sup>1</sup> 参见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UK) and Cambridge(USA): Blackwell, 1995[1986].

<sup>2</sup> 参见拙著《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37-50页；拙文：“何以边为：巴特族群理论的启迪”，《学术月刊》，2017年第七期，第99-110页。

<sup>3</sup> Anthony D. Smith, *Ethnic Origins*, p. 29.

<sup>4</sup> Anthony D. Smith, *Ethnic Origins*, p. 30.



张的历史非连续性也非无源之水。但我们确实不能忽视导致历史发展路径选择的偶然性因素（contingency factors）。

人类学对族群边界和认同过程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安德森的问题意识。对族群认同形成和“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的研究表明，族群认同总是在充满起伏、不断生变的过程中彰显其重要性。这在资源争夺、话语权争夺和族群边界遭到持续性威胁的条件下，具有团结成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民族主义运动通常发生在具有国际意义的环境里。在这里，民族边界（national boundary）取代了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民族主义运动之所以表现为寻求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乃国际政治秩序所使然。成为一个民族可以自我认定，但必须得到外界认可才真正有效。

## 二、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强烈的亲和性。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的一些思想因子，在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欧洲社会。启蒙主义思想家就相信社会总是往前发展，尽管可能会有反复。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之后，社会上对达尔文提出的演化机制错误地理解为“适者生存”，原先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仿佛寻得其合法性，遂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名。其实达尔文所认为的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所以演化是没有方向的。演化在达尔文的眼里不一定带来“进步”——这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三大概念之一（另两个是科学和理性）。如果说包括人类学在内的19世纪欧洲社会人文各界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当时科学界的进化观的影响，那就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进废退”理论（theory of use and disuse）<sup>[11]</sup>。

拉马克的学说包含了“进步”的观念，这才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需要的。但是，达尔文学说在社会所引起的巨大轰动，以及所形成的氛围，无疑影响了民族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者的心和野心。应当看到，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民族主义就是以帝国主义为榜样。孙中山1924年1月到8月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表明他的态度：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孙中山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在批判列强视中国为刀俎鱼肉的同时，也不忘以英美等世界强权为榜样。换言之，孙中山寄望于民族主义帮助中国摆脱列强的控制，又期待中国有朝一日可以同列强比肩——而这也有赖于民族主义<sup>[12]</sup>。有趣的是，所有当年的民族主义者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达尔文的学说与他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之间存在着相悖之处。套用出生南非的人类学家库柏批评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的话：“达尔文的凯歌催生了一种非常不达尔文的人类学。”<sup>[112]</sup>我们也可以说达尔文的凯歌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就是一种亮肌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了跻身世界之林，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也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

因其如此，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蜕变为一种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之间的互联性和亲和性导致了民族主义运动在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尽管安德森讥讽将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定在西欧是一种“地方主义”偏见。但如果从对世界格局和人们观念的冲击来看，在欧洲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在短程的意义上，远远强于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美洲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则未必，因为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崛起也是美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后果。在欧洲，民族主义则成了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导火索。

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在盖尔纳的概念中涵盖了几个时区。除了英法之外，主要思想源头来自德国。学术界因其精神原则冠之以“族群民族主义”，也就是科恩所谓的东方民族主义。族群在

此指的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并不是所有族群民族主义运动都燃起战火。有些政治单元或者传统国家在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平稳过渡，特别是那些原先独立的，与邻国没有边界或者其他纠纷的政治单元。德国和受到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国家强烈影响的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英法和美洲的民族主义表现得不太相同，但同样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和逻辑，相信国家必须建立在统一文化的基础之上，而统一文化的形成首先靠的是说和写同一种语言，而这些操同样语言的人们就是民族，国家只有与民族结合在一起才具有竞争力。族群民族主义往往有仇外倾向出现。仇外是民族主义者进行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的养分。德国的民族主义所愤怒的对象是法国，因为他们觉得日耳曼的人文成就和自我意识绝不在法兰西人之下。如果“仇外”是一个过于严厉的措辞，我们可以用靶子或者出气筒来取而代之。换言之，今天，一提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固然让人感到十分血腥。但事实上未必尽然如此。可总得有合法的出气对象，于是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靶子是大英帝国，尤其是英格兰；巴斯克人的对象则是西班牙和法国；魁北克的对象则是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凡此种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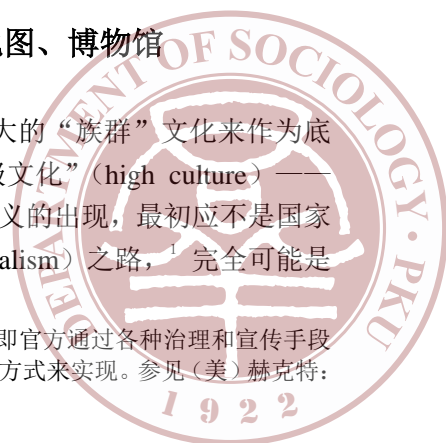
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始终是世界不安情绪的由来之一，人们对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另一面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可能是对民族主义运动有种想当然的负面预设所使然。没错，民族主义运动确实给人类带来许多身心创伤和社会创伤——时至今日，许多民族之间仍然视如寇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这个世界经历了多少次民族或者种族仇杀？从巴尔干半岛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到非洲的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甚至缅甸。这些残酷而血腥的战争暴行和公开的反人类行为，有哪一次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今天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分离主义者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所谓“民族诉求”，如曾经很活跃的北爱尔兰恐怖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若干派别等。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在与全人类为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民族主义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所做的巨大贡献。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并不全是持枪进行武装斗争战士，他们当中更多的是用自己的专长为民族独立做贡献者，以自身的才华来表现民族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形式在挣脱帝国主义列强桎梏的过程中，起了鼓舞民心、激励民众的作用。由于族群民族主义是以原先族群文化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在共同文化之上寻求建国的过程，为了表达这样的诉求的合法性，围绕这样的主题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涌现了大量的音乐、美术、文学作品。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景观和历史都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载体<sup>[13]</sup>。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泄可以通过对民族主义者所期待建国的国土山川的讴歌和礼赞来表达——这样的做法在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的叙事当中都可以看到。最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在民族叙事当中就是对历史战胜外来入侵者的主要人物以歌颂和树碑立传，那些以弱胜强的军事首脑往往成为国家的民族英雄，他们代表着民族自强的灵魂。而在这些叙事当中，宏大和悲壮也就成为主旋律。这种大的场景的展现呈现的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屹立于世界之林是一场竞争，只有强者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 三、叙事与认同——传统、先贤祠、纪念物、地图、博物馆

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终会走到强调民族应该由国家版图内最强大的“族群”文化来作为底盘，但在许多政治单元的社会里，这一文化——盖尔纳称之为“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却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才“创造”出来的。科恩所谓的西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最初应不是国家的蓄意而为；而最终走上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nation building nationalism）之路，<sup>1</sup>完全可能是

<sup>1</sup> 这是赫克特提出的概念，也有称之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者，即官方通过各种治理和宣传手段来实现国家社会整合的过程。具体手段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本章所描述的各种方式来实现。参见（美）赫克特：



因为政权认识到，共享文化或者共享某种价值和精神原则对于凝聚民心、建构民族认同的必要性，进而顺势而为的结果。无论如何，正如盖尔纳和安德森都指出，这些东西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工业化）和技术创新（印刷资本主义）有关。理论而言，东方民族主义即族群民族主义则反是。东方民族主义强调共享语言和文化的人群应该是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表述的原型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赫尔德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活跃于 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初年。他宣称，生活在同一种地理环境状况下的民众，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理应是一个民族而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雄辩的“民族性”表述令人联想到私有财产观念——你拥有什么决定了你的身份地位。因而赫尔德不啻是在说，正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地理环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国家的民族。赫尔德的这一表述 19 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多少将民族主义的本质理论化<sup>[6]68</sup>。赫尔德的这一思想之所以能成为 19 世纪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诉求和形塑人们对民族的认知，与当年德国思想界在欧洲的影响力有关系。德国统一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认知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尤其在“一战”前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民族国家成为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这就是说，只有民族国家才有资格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置喙。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风起云涌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霸权主要掌握在英国手里，但是欧洲的文化霸权却是法国甚于英国。大部分的欧洲大陆国家王室贵族在生活上都以法国上流社会为参照，生活作派法式贵族化、讲法语、用法文写作，似乎处处以显示其“法国性”为荣。法国的王宫贵族们自认为自身的文化是文明的，具有普世意义。而在 19 世纪，德国依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而且也没统一，全国由许多大小不一的政治单元所组成。其中，以普鲁士实力最强大，但也依然是个农业国家。虽然经济政治不如人，但教育和文化却不落人后，在思想界更是群星璀璨。虽然直到 1871 年德国才实现第一次统一，但德意志土地上的人文成就绝不逊色于强大的英国和法国，而且其思想界很早便有德意志自我意识。

赫尔德关于文化的许多论述就是出于对法国霸权所宣扬的“文明”的不满。在德意志要求统一的上升时期，赫尔德的理念自然广泛传播，尤其是在一些深受 18 世纪以降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浸染的中欧和东欧国家。1871 年，德国在历史上首次统一。然而，在这段时间前后，受德意志思想文化影响的许多国家也纷纷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多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先导，大量的作家文人强调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在当时，俄罗斯文人以使用法语为时尚。普希金是否为倡导母语写作的第一位俄罗斯人不得而知，但他的影响一定是最大的。

学术界将通过弘扬自身文化，展现和建构文化传统的文人、艺术家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者（cultural nationalist）。他们在民族统一的过程的主要工作是发掘所谓民族文化的遗产和精髓，他们相信这些精髓隐藏在历来不为关注的民众生活当中。他们的实践甚至催生了民俗学（folklore）的诞生。今天世界上许多人颇为享受的一些电影和故事，如《指环王》《阿凡达》等，都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发掘出来的北欧的民间传说。而全世界人们耳熟能详的格林兄弟故事和安徒生童话也同样如此。大量的有闲阶级认为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氛围中被发掘出来，并经过再创作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整个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收集有关所谓的前现代（premodern）的各种口头文献和物质资料成为定义现代民族疆界（national boundaries）和书写和展现民族历史的正当性活动。这方面的工作能令民族主义者沉醉其间，也是因赫尔德关于“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理论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底层阶级口头传承是

《遏制民族主义》第 74-81 页；Benedict Anderson, *Imaged Communities*, p. 83-112, 163-206.



民族文化的代表。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人都受其影响投入收集研究各种口头文学、歌谣、民俗、民间故事、话本、唱腔的工作中。芬兰学者安托宁（Pertti Anttonen）指出，在芬兰民族主义运动中，芬兰一些学者之所以深入东部边远地区的村庄和森林地区如卡累利阿和英格里阿（Karelia and Ingria）收集不识字的边缘人群的口头文学，就是因为他们都承担着强烈的民族政治动机和民族主义目的<sup>[14]</sup>。

民俗学在以德国为中心的中、东欧甚至北欧诞生之后，很快也传播到其他大洲。比如中国和日本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家相信国家或者民族文化的根子应该在民间生活里；精英文化即贵族或者达官贵人所代表的官方文化是霸权性文化（hegemonic culture）即主导性文化，它仅仅属于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并不代表民众，因而是腐朽的。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的文化即民俗文化（folk culture）和生活传统，完全为统治阶级所无视，完全不见之于主流叙事当中。这种情况与民族主义时代之前的中欧和东欧的情况相似——教会和王室贵族以及达官贵人们控制了社会。拉丁文依然在天主教中沿用，而王室和上流社会以使用法语为时尚。拉丁文在当时显然已经走向衰亡，仅在教会中一息尚存。像这样毫无生命力然而却在语言权力关系中居于顶端的语言，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成为挑战的对象。法语不仅是外来的，而且仅在王室贵族中流行。这种情形在民族主义时代也直接刺激了民族意识的产生。在德国和其他中东欧、北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许多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民族自觉，他们提倡使用“方言”（vernacular language——相对于拉丁语）——也就是本民族语言进行书写和创作。这一转变始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卢梭和伏尔泰等人都是用法语写作，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带来的变化，法语成为了欧洲其他国家上流社会的时尚。但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中，又成为其他后起的民族国家予以摆脱的外来语言。<sup>1</sup>

在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先驱如容肇祖、顾颉刚、常惠、姜子匡等人，他们到民众中去做了大量的采风——有些类似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更多地强调对民间各类口头文学的调查。北京大学在 1922 年 12 月创办《歌谣周刊》，发表的歌谣除新疆、西藏、热河外各地都有，其内容以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歌谣和儿歌为多，也有不少情歌、仪式音乐（喜歌、丧歌等），还有一些时政歌谣以及各好民间的劳动号子和一些劳动职业群体独特的曲子曲调等；形式上以只说不唱的民谣和曲调自由的山歌、小调为主。这些当年都纳入“国粹”的范畴，由此足见当时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而当时我国的这一背景又有着另外的说法，即“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国粹或者新文化运动，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有欧陆族群民族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民俗研究的影子。20 世纪前 30 多年间，我国民俗学家深入生活，写下大量有关民俗民风的调查报告、专著、论文。从他们的发表的著作来看，显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不仅在工作方法上，而且在精神上也秉承了柳田国男。鉴于 19 世纪也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时代，柳田国男受到欧陆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具体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上的现实条件，民族主义也未必全无积极意义。人们现在会为民族主义都是仇外的。然而，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却认为，民族主义最初是包容的。民族主义

<sup>1</sup> 赫克特认为，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与其他国家一样，实行“间接统治”。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表现在税收制度和设计上。国王通过监督官（intendants）和王室代理人来征集税赋。但在农村，这些主要通过地方政权来执行，主要是贵族和牧师。这些人小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避免得罪巴黎而受其干扰。只要这种中央与地方的交易关系处于稳定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随着中央对权力和资源需求的膨胀，最终引发了乡村贵族和农民的反弹。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就认为，18 世纪末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起因就是国王要求增加税赋的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大革命之后，随着地方贵族的位置被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所取代之后，这些人也开始抵制中央的控制。中央不得不采取策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除了划分新的层级性的行政单元之外，还在税务、司法、公共工程和治安等方面实施了改革，并通过对军队的掌控，国家牢牢地掌控了地方政府。这些改革将资源大大地集中到了巴黎，逐渐降低了公民对地方政权的依赖程度，使法国当时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参见（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第 69 页。



始于法国童话“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代表着普通民众战胜了旧制度的腐败君主制势力,其标志就是法国大革命。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变成鼓动仇外情绪,甚至发动种族灭绝(genocide)的社会运动<sup>[5]6</sup>。20世纪以降的民族主义运动一般都有现实的,或者假想的敌对民族。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针对的敌人起初满清,所以最初口号是“反清复明”,继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以此为感召。当下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分离运动所针对的当然是英格兰。而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则是要求从伊朗、伊拉克等国中分离出来,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加拿大魁北克也存在着分离的力量,要求从讲英语的加拿大脱离出来,建立魁北克国家。巴斯克民族主义也同样如此,要求从有关国家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些要求分离的民族主义宣传往往强调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包括语言、宗教在内的文化独特性。

民族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文化独特性涉及许多方面。许多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艺术家、作家本身的创作就会按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更有许多则因为在创作当中大量地采用了民间素材,他们的作品因此也会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来鼓舞民众和当作民族叙事表述。当今音乐学界将部分古典音乐称为“民族乐派”道理就在于此。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活跃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北欧和东欧的音乐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被认为是所在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或者积极参与者。芬兰的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交响诗《芬兰颂》(Finlandia)气势恢宏,真切而有力讴歌千湖之国雄浑的自然景观,表达芬兰摆脱枷锁的期盼。惧于这部作品所产生的连带效果,沙皇俄国竟然下令禁止演奏这一作品。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以及俄罗斯的几位作曲家如格林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人,也都被所在国家公推为民族音乐家,他们的作品都起了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肖邦则是另外一种杰出的例子。他的作品未必尽可归为民族乐派,但还是大量地运用了波兰民间的元素。而且他以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他视为祖国的波兰(他的父亲是法国人)同胞,为波兰摆脱强权瓜分重新统一做斗争。肖邦也因此一直在波兰的民族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于其他表现传统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各种象征性的东西,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都是“发明”的。因为许多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创作过程都要发掘传统来打造本民族的特点与恒久性。吉登斯说,许多所谓的传统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过去两个世纪多,甚至更为晚近的产物。吉登斯和霍布斯鲍姆都提到的被当作苏格兰民族象征,男性穿的花格子呢裙(kilt)和风笛(bagpipe)就是如此。霍布斯鲍姆与兰杰尔(Terence Ranger)合编的《传统发明》的书中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类似例子<sup>[15]</sup>。吉登斯说,苏格兰男性的花格呢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且是英格兰工业家托马斯·罗林森(Thomas Rawlinson)在18世纪发明的,并用它取代了高地苏格兰男人的裙子以便于工作。这种短裙成为苏格兰民族服装和文化标志是后来的事情。苏格兰人中的大部分是低地苏格兰人,他们认为高地人的短裙是野蛮人的装束,而且引以为耻。用于表示不同氏族的花格图案,则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裁缝设计的,他显然看到了商机。吉登斯还提及大英帝国如何为印度寻找文化遗产的趣事。在1860年之前,印度士兵的军服与英国军人无异,都是西方制服。但此后则让印度士兵使用缠头、肩带(sashes)和短袍(tunics),以示其“本真”<sup>[16]54-55</sup>。“他们所发明的或者半发明的一些传统在这个国家的今天依然持续着,虽然后来自然地淘汰了一些”<sup>[16]55-56</sup>,吉登斯如是说。

在民族主义运动或者民族建构过程中最为醒目的是构建各种纪念物缅怀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牺牲的仁人志士。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些纪念物包括纪念碑、各种战争和英雄和著名人物的街头雕塑、衣冠冢、无名烈士墓或者无名烈士纪念碑、先贤祠、忠烈祠之类的建筑。很多在这些物体面前的活动都是仪式性的。仪式对于加强人们的团结,强化某种情感行之有效。这种原先具有宗教信仰意义或者神秘色彩的社会团结行动,到了民族主义时代自然被用来强化人们的民族归属,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发生一种对民族国家崇拜的情感联结。所有国家都有诸如民族解放纪



念碑之类的方尖碑建筑，都有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展现官方口径的民族国家历史。安德森说，博物馆和想象共同体的博物馆化（museumizing），二者都是强烈政治化的（profoundly political）。他指出，东南亚国家出现大量的博物馆是活生生的政治继承过程，理解这种现象需要考虑到 19 世纪新奇的殖民地考古学。因为这种考古学，这些博物馆才可能存在<sup>[6]178</sup>。换言之，这是东南亚新兴国家为了自己的想象共同体必须缔造一种源远流长的国家存在形象，而与这样目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殖民地考古资料为新兴国家的民族叙事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素材，而对这些素材的解释口径是官方的。

无名烈士纪念碑、衣冠冢经常是民族建构不可或缺之物。没有什么比衣冠冢和无名战士纪念碑在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中更引人注目了。安德森认为，围绕这些纪念性建筑的各种纪念仪式需要它们是空的，或者不知道里面是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古希腊有衣冠冢，但是这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找到死者遗体<sup>[6]9</sup>。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公认的世界同类型建筑最出色的国家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s）——墨尔本也有类似纪念建筑。战争纪念馆纪念历史上参加战争的澳洲烈士。重要的是，这些战争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还包括了近代由英美主导的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澳大利亚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后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战的。这象征着澳大利亚从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因而成为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表述：澳大利亚历来都是以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而不是以殖民地国家的性质参战（尽管未必尽然如此）。战争纪念馆的象征意义如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具有民族认同建构和凝聚民心的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

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现代民族表述，是法兰西共和宪法的具体体现。先贤祠内目前葬有 72 位在各方面为法国作出贡献的人物。从卢梭、伏尔泰到居里夫妇和大仲马。除了大仲马之外，文学家还有两位——雨果和左拉。大仲马虽然非常著名，但毕竟是通俗小说家，其文学成就在璀璨的法兰西文学殿堂里根本排不上号。他的遗体直到 2006 年才进入先贤祠，之所以如此当然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大仲马黑白混血，一生中不断受到种族主义者的骚扰，但是他政治立场鲜明，终身主张共和制。当代法国政府为了体现法兰西民族的多元构成才将大仲马遗骨移入先贤祠。左拉是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作家，他入祠的原因政治性甚于其文学成就。左拉卷入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案件，他写的公开信《我控诉》引起社会强烈共鸣，最终推动了法国当局为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平反<sup>[7]106-107</sup>。

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强调贫穷与富裕之间、无产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根据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性排斥与包容唯有追随的原则就是民族的边界，而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则是拥有共同文化的民众（people）<sup>[17]</sup>。通过象征的方式锻造民族共同体的方式还包括建造博物馆、绘制地图、唱或者演奏国歌、升国旗、阅兵式、国庆日游行庆典，以及各与民族文化、历史有关的文娱和才艺表演和有关知识竞赛等。原先殖民地宗主国或殖民地国家为了控制和掠夺，延续了帝国绘制地图的传统。绘制地图与人口统计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在殖民地国家的地图绘制中，通过人口学的三角定位测量将人口统计所作的人口类别标记在地图上，使不同族群的分布地貌得以认识。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地图提供了至少两种想象的条件。

其一，地图为这些人口类别（族群）提供了一种历史纵深感，预示（prefigure）了 20 世纪东南亚的官方民族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各种地图，尤其是历史地图，催生了民族国家某种政治传记叙事。采纳或者适应这种叙事的民族实际上是从殖民国家那里获得这种“馈赠”<sup>[6]175</sup>。

其二，第二个条件是地图作为徽标（map-as-logo）。帝国经常在地图上为其殖民地染上颜色。大英帝国在地图上用粉红色（pink-red）表示其殖民地；法国则是蓝紫色（purple-blue）；荷兰用棕黄色。虽然贵为帝国属地，但这样的颜色使殖民地与宗主国判然有别。一旦情况有变，这些如

同拼图上不同颜色块块就可能从地理脉络中成片脱离。总之，地图作为徽标深深地渗入民众——想象共同体变得有形可鉴——终成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之强有力标志<sup>[6]175</sup>。

大部分国家的博物馆也都在型塑公民的国家或者民族认同建构上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博物馆原先来自于达官贵人或者探险家、收藏家们在一定范围内展示他们的藏品的地方，它可以是专门的建筑，也可以在包含在家庭建筑里，也可以在租来的场地里。博物馆很早就存在，但其大规模兴起则与海外殖民地开拓有关系。当博物馆成为“布尔乔亚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时，就形成了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并由此转而成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人们经常聚集在这样的空间里议论时政等<sup>[18]</sup>。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旦民族主义利用这样的空间来展示他们的诉求，博物馆可以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形塑民众的民族认同的一个阵地。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博物馆更是成为用以宣传的工具。不仅博物馆自身，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有一些将一些公共空间博物馆化。欧洲许多国家都把本国历史上和现代的著名人物包括在文化、科学诸方面和军事上作出贡献者在公共场所立碑竖立起他们的各种塑像，就是例子。在这些雕塑周围或者底座，人们可以看到文字内容，解释为什么要立像纪念雕塑人物。有些国家更是将民族主义武装斗争的武器陈列在城市广场之类公共场所，提醒人们铭记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惨烈。

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的许多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具有意味深远的政治意义。他以雅加达的博物馆为例告诉我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印尼是从它最近的祖先——荷兰殖民者东印度公司那里习得这种方式。整个东南亚的博物馆表明了一种政治继承的一般过程是如何行动的。而理解这一过程则必须思考使博物馆成为可能的新奇的 19 世纪殖民地考古学（colonial archaeology）。

直到 19 世纪早期，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对于展示这一区域文明的历史一直缺乏兴趣，直到后来一位叫拉夫勒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殖民地官员出现才有所改变。拉夫勒斯对各种文物兴趣浓厚并系统地研究当地历史。东南亚文明如爪哇的博罗布杜神庙遗址、柬埔寨的吴哥（Angkor）等东南亚文明古迹从密集的丛林中显现出来，被发掘、丈量、摄影、重构；被保护起来成为了研究对象，以及展示。殖民考古服务当局（Colonial Archeology Service）成为一个有权势和名声的机构，吸引了一些卓有才华的学者型官员。随着作为殖民地管理的代理者东印度公司的衰弱，以及现代殖民地统治的崛起对殖民地直接掌控，殖民当局的声望也就与其母国的优越声望亲密地联系在一起。殖民当局也在殖民地营建起各种纪念碑、雕塑等。考古学努力投入这方面的建设，帮助在地图上标示这些纪念物件的分布和公共教化等工作。而作出贡献的死者名录也在编纂之中。

博物馆工作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培养国民民族意识的作用。通过展现民族文化的辉煌或者苦难的过去，博物馆起了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所以正如博物馆的宗旨所宣称的那样，博物馆除了具有收藏和展示陈列的功能之外，还是教育的辅助机构。而地图和统计的结合，例如，语法也如同博物馆那样，型塑了共同体的想象。在殖民主义淡出世界舞台许久之，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东南亚国家，这些都源于当年殖民地国家对历史和权力的想象<sup>[6]185</sup>。

总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筛选来编纂民族国家的历史；对祖国山河的礼赞和讴歌来激发群体自豪感，是建立民族认同之主要手段和策略。正因为如此，经常很难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法国著名学者、民族主义者勒南（Ernst Renan）才认为，所谓民族其实是一种精神原则，它包括两部分：过去和现在；由享有共同记忆所带来的精神遗产，以及一起维护这一精神愿望所构成。<sup>1</sup>

<sup>1</sup> 参见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What is a nation), selected in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Smith eds.: Nationalism: Oxford Readers. Oxford and New York, 1991; 勒南的文章最早出版于 1882 年。

## 四、结论

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命定的——许多有潜力成为民族的群体并没有成为民族。所以，民族主义的发生有其自身逻辑，如果其他没有成为民族的群体想要成为民族，也得遵循这样的逻辑，但能否成功还得看国际社会是否认可。所以，民族是这样的群体，它必须自我界定之外，还必须要有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国际社会是否认可和一个宣称为民族的群体为民族，又受到其他国际政治或者干脆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的制约；也会遭受到强势国家的干预，或者鼓励，或者阻止。

民族主义出现的历史条件涉及到它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全球化之间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这种互联性是“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在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大航海时代”里，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工业产品武器等从西欧到西非交易，再从西非进行奴隶买卖，将黑奴运送到美洲的种植园；再从美洲将原材料产品运送到西欧）刺激和加速了工业化和出现和发展。盖尔纳认为，工业化所强调的标准化和教育普及，是社会由异质性转变为同质性的催化剂，民族意识也就在这当中成长起来。换言之，民族的形成是功能性的。虽然盖尔纳的观点在不少细节上经不起推敲，但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盖尔纳的主要观点可以与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的主要论点相互支持。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诞生迎来了印刷资本主义和媒介资本主义的出现，这就为工业化过程出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也由此建立起来。

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社会达到第一个高潮。这与时代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励不无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亮肌肉”性质的思想工具。拜其所赐，民族国家终于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单位。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号登上了人类群体类别的顶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众多民族主义志士的奋斗目标。

共享记忆与忘却在民族建构中不可或缺。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之际，许多激励人心的文本、口号、象征物等已经告诉人们，作为一个民族成员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从何而来？当然要通过“教化”，教化如何实现？有赖于各种政治宣传以及各种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如建立纪念碑、无名烈士墓、衣冠冢、绘制地图、建立博物馆以及各种历史书写。这就是通过礼赞民族国家历史上的过去、山川河流的壮丽；书写历史上的成就与屈辱和强调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国内公民的同一性来实现。这是所有民族国家建立自身民族认同的一般策略和手段。在这方面，文化民族主义者居功至伟，他们以自己充满激情的创作为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令人血脉贲张的营养素，他们所创作的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为建立一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这些无非说明，民族国家的民族是建构的；民族主义既服务于帝国主义，也可以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工具。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必定经历共享记忆与忘却——记忆的是与民族过程有关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实践；记忆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和痛苦。这些都是孵化民族成员之民族意识之关键所在，是为民族认同建构的有效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中华民族时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中华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构成中华民族的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在长期往来接触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关系，但并没有觉得是彼此是相互依靠难以分离的群体。只有在走入近代之后，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历史条件，才意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了自觉意识<sup>[19]</sup>。

在世界上所有民族建构过程中，历史书写、博物馆和纪念馆、纪念碑以及对一些传统的强调

甚至重建、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都是树立国家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必备条件。在这些工作中很多东西必须通过象征来实现。这些象征之物可以来自历史，也可以是民族主义利用历史和民俗来创造。这些对于国家社会可以产生凝聚力，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尤其如此。今日所见之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代表着一种排外倾向，这种情感已经与民族主义最初的“睡美人”形式背道而驰。如何在坚持自身民族自豪的同时，又能自觉地摒除排外仇外的消极能量，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者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 参考文献:

- [1] Gellner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 Connor W.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1(4): 379-388.
- [3] Kohn H.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1967[1944].
- [4]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1907-1913）》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3: 294.
- [5] 赫克特. 《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6]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1991[1983].
- [7] 范可, 《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 [8] Ozkirimli U.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40-142.
- [9] Anderson P.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1992:205.
- [10] Kedourie E.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1994 [1960]: 143.
- [11] Kuper A.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Psychology Press, 1988.
- [12] 孙中山,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M]. 曹锦清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66.
- [13] Smith A 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41
- [14] Anttonen P.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SKS, 2016[2004]: 83.
- [15]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Giddens A.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Taylor & Francis, 2003:54-55.
- [17] Eriksen T H.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102.
- [18]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IT press, 1991.
- [19]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1989 (4) :1-19.

